

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
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
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



管虎/监制 徐展雄/导演

革命者

2021.7.1 上映

《革命者》海报

电影《革命者》

用浪漫主义手法为人物立传

晓筠

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片，《革命者》自7月1日上映后，赢得了观众的较好口碑和评论界的热烈反响。与以往革命历史题材、人物传记题材影片相比，《革命者》在主题表现方法、叙事结构与风格，以及人物刻画手法等方面表现亮眼，令观众耳目一新。影片以充沛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，以及对电影本体的先锋探索，鲜活丰满地描摹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这一人物形象。

《革命者》最值得称道的，当属影片的叙事结构。影片聚焦李大钊自1916年回国到1927年英勇就义期间的人生华彩篇章，以李大钊在狱中临刑前38小时的时间为主要叙事线，展现了他舍生取义、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。同时，在这条时间主线上串联起李大钊人生中参与的重要事件和情节，以及与其他人物的人生交集。

《革命者》从俄国人在上海租界街头枪杀报童徐阿晨事件，勾勒出颇为复杂的时代背景和剑拔弩张的多方政治力量，李大钊带领人们走上街头，反抗暴行，最终为阿晨伸张正义。影片这一情节的设计，奠定了李大钊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、宣传十月革命和推动工人运动的民众精神领袖的人物底色。接下来，几段精心选取并淋漓表现的情节徐徐展开，展现出李大钊在“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”，倡导和促进国共第一次合作、建立统一战线，启发青年毛泽东深入农村基层，重视革命武装等方面重要的历史贡献。这些情节构建起当时中国革命各阶层的鲜活图景，其中既有毛泽东、陈独秀、孙中山、蒋介石、张学良等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，也有李庆天、徐三等普通小人物，还有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。

难得一见的是，《革命者》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呈现出不落窠臼的影像风格与美学气质。影片中，这些非线性叙事，貌似碎片化情节的串联，以人物记忆、情绪、潜意识、直觉等意识流风格的艺术表现形式，运用闪回、倒叙、插叙等表达手法串联起时间与空间，使得时空跳跃多变、纵深多维，大大扩大了影片的容量，深化了主题。有别于一般影片以时间或情节为逻辑和线索，《革命者》的情节显得发散，但在与李大钊共时性的历史书写中所表达的精神气质，都汇聚到革命者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上，展现出散文式“形散而神不散”的美学特征。此外，影片中多处出现的写实与写意、隐喻和互文，都给该片的革命浪漫主义和诗意化增色不少。

《革命者》中的李大钊，在与其他人物关系的多棱映照下，展现出立体多面的性格特征和真实鲜活的生命细节。这个“投身黑暗以换光明之人”有血有肉地立了起来：在革命青年面前，他慷慨激昂，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指明灯；与陈独秀在一起时，他既谈革命理想也斗嘴要贫，两人的反差与默契、惺惺相惜都非常动人；在妻子身边，他会靠在妻子肩头哭泣，显露出少有的孩子般的脆弱。影片不仅展现李大钊做过哪些事，更描摹出他是怎样一个人，他的抱负与希望、情感与心态都深深地感染着观众。

离开众庶，则无英雄。影片结尾处，李大钊掷地有声地说：“你们要相信……”工人学生和孩子们高声回应的一句句“我相信”，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信仰的力量、团结的力量。让我们用历史映照现实、远观未来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、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、开创美好未来。

乡村创业书写中的丰富表达

——以杨遥中篇小说《父亲和我的时代》为例

王春林

伴随着中国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，最近一个时期，在乡村小说创作领域，出现了一种可以被命名为“创业书写”的创作潮流。诸如关仁山的《金谷银山》，贺享雍的《天大地大》、陈毅达的《海边春秋》、赵德发的《经山海》、滕贞甫的《战国红》等长篇小说，以及杨遥的中篇小说《父亲和我的时代》，都可以看作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。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，但其中存在的不足尤其值得反思。《金谷银山》中的情感描写、《天大地大》中的个人成长以及《海边春秋》中的矛盾解决等内容，使我们反思创业者的成长动力和小说叙事逻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。乡村小说中的创业书写，应在摆脱文学传统窠臼束缚的前提下，尽可能地回归到艺术本位，塑造复杂的创业者形象，真正实现乡村创业的文学化书写。这一方面近期较为理想的一个小说文本，恐怕就是我省青年作家杨遥的中篇小说《父亲和我的时代》。

《父亲和我的时代》讲述的是一个新时代普通农民的创业故事。父亲原本是乡下一位技艺超群的裱匠，怎奈伴随着装修进入千家万户，逐渐处于失业状态。一方面是技艺的失落，另一方面是母亲的过早弃世，两方面结合起来的一个直接结果，自然也就是父亲的“失魂落魄”。父亲“失魂落魄”的有力证据，就是他的服饰不仅总是脏兮兮的，而且似乎连脸都懒得洗。但就是这样一位看似早已被时代甩开的农民父亲，某一日却突然要求“我”给他买一部智能手机，还赶时髦一般地玩起了微信。原来，一贯邋遢的父亲，突然间出人意料地做起了微商。用父亲自己的话说，经营品种繁多，既卖小米，也卖核桃、蜂蜜、酸枣、荞麦、胡麻油、土鸡蛋，而且已经把生意做出了国门之外，连远在西非的多哥，竟然也有人在父亲这里买东西。

日常生活早已“失魂落魄”的父亲，何以会如此这般地突然间便“脱胎换骨”呢？针对“我”的疑问，父亲给出的回答是：“本来也没想过做这个。村里第一书记组织培训，没人去。人家就说去一天给五十块钱，还管饭。人们谁也不信这是真的，刘桐拉我去看，去听了几节课，觉得人家讲得有道理，想试试吧。一试还行，反正现在裱家的也少。”

紧接着，就是“我”随同父亲一起冒雨到县城发货情形的描写。正是在这次发货过程中，“我”才真切感受到父亲作为一个微商经营者的敬业精神。他宁愿自己被雨淋湿也不肯让货物被雨淋湿，还坚决不肯因为拖延发货时间：“不行，一迟就耽误了信用了。我不想等，接下单就想发货。”说到底，父亲之所以能够把微商做得风生水起，与他具备这样一种敬业精神，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杨遥在塑造父亲这一人物形象时，并没有做一种简单化的处理。比如，就在我们以为父亲因业绩突出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微商事业中时，作家却又不期然地荡开一笔，揭示出父亲内心深处对裱匠手艺的由衷留恋。当“我”以微商的经营成功为由，劝父亲不要再爬上来、爬下去地为别人裱家的时候，父亲给出的，竟然是这样一种出人意料的回答：“做微商和裱家怎么能一样，微商谁不能做？裱家是咱们家的祖传手艺，你爷爷传到我手里几十年了，总不能让它断了吧？”关键还有父亲讲述这段话时的神情变化：“父亲说着情绪渐渐低落下去，人也顿时好像黯淡了。”

原来，尽管父亲的微商创业生意已经做得风生水起，但在他内心深处，却依然留恋着祖传的裱匠手艺。这一细节的出现，充分说明父亲的某种精神情结之所在。很显然，在父亲的理解中，裱匠其实已经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艺，更是自我价值实现的象征。事实上，也正是因为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，身为写作者的“我”才千方百计地要约请禹导演来专门为父亲的裱家过程拍摄纪录片。在这里，裱匠手艺可以被理解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但更应该被看作乡村精神的一种传承。一方面能够在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下积极从事微商的创业活动，另一方面在内心里却又深深地依恋着家传的裱匠手艺，以上两个方面的并置性存在本身，就意味着父亲这一人物形象性格层面上具备某种丰富性。

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，这样一部以父亲的微商创业为核心故事的中篇小说，原本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被命名为“父亲和他的时代”，但杨遥为什么非得把它命名为“父亲和我的时代”呢？这个问题，其实也已经关涉小说到底

为什么一定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问题。更进一步地说，正是由于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采用，所以小说文本中也就形成了两条时有交织的结构线索。一条是身为裱匠的父亲做微商创业的故事，另一条则是身为父亲儿子的“我”一篇名为《隐疾》的小说的写作过程（需要强调的一点是，现实生活中的杨遥竟然真写出了一部名为《隐疾》的中篇小说，发表在《芙蓉》杂志2020年第4期上）。“我”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后，很快就用一个多月时间完成了这篇小说。断断续续的修改过程，也就成为隐约贯穿于《父亲和我的时代》这一小说文本的另外一条结构线索。一直到最后一刻，听着父亲他们的歌声，“我觉得以前的视野太狭隘了，而父亲他们，我认为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人们，竟然跟着时代奔跑。我忽然想起我的小说《隐疾》。”

尽管我们不知道《隐疾》的基本状况，但依据片言只语的介绍，再进一步结合充满暗示意味的标题名，我们即不难判断，《隐疾》应该是一篇带有一定现代主义色彩、旨在关注表现精神世界负面构成的中篇小说。唯其因为负面，所以才叫“隐疾”。很大程度上，正是因为身为一代的“我”身患“隐疾”，所以才会觉得父亲他们是在“跟着时代奔跑”。就这样，原本应该属于“我”的时代，真正的引领风骚者却变成了父亲他们。大约也正因为如此，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者才会在《卷首》中这样评价小说中的父子关系：“这篇小说与脱贫主题有关，又不局限于这，其妙处还在于‘我’的自视——在父辈唱出新曲的时候，自己的曲库里竟然只有老歌，时代深处生长出的活力与不接地气的‘隐疾’的并存，只存在于这一对父子关系中吗？仅就‘父子’加‘人与时代’的原型模式来看，这对父子的行动与《创业史》中的梁家青年进步、老人犹疑的状态正好倒错了起来。”

虽然说杨遥的《父亲和我的时代》已经尽可能地实现了乡村创业的艺术化书写，但说实在话，认真地检点一下就可以发现，包括杨遥小说在内的旨在书写表达乡村创业的小说作品，还远远没有抵达柳青《创业史》的思想艺术水准。就此而言，中国作家在未来的岁月里，的确称得上是任重而道远。

寓言：新时代要有新姿态

刘江伟

日前，中国寓言文学馆在浙江温州正式开馆，成为我国首个具备寓言文学藏品收藏、展览展示、线上宣传教育及线下研学实践功能的文化地标。

寓言，这颗文学皇冠上的明珠，借助新的科技，散发出新的光彩。

新科技成果成为寓言主角

中国自古是寓言大国。在世界文学史上，希腊、印度和中国并称三大寓言发源地。寓言简短、轻快、有趣，浅显易懂而富有哲理。

我国十分重视寓言教学和寓言创作。在语文课本中，《守株待兔》《陶罐和铁罐》《鹿角和鹿腿》《池子与河流》《小马过河》《白头翁的故事》《揠苗助长》《乌鸦喝水》等中外经典寓言故事，构成了孩子们共同的文化记忆。

寓言寓教于乐，是孩子们特别乐意接受的一种教育方式。它既关心社会的现实，也关注人性的真实，总是在潜移默化中丰富着当代儿童心灵。

近年来，随着我国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，寓言文学创作也进入了新的阶段。作品数量和样式不断增加，出现了寓言散文、寓言剧、寓言体童话、寓言相声、科学寓言、系列寓言和微型寓言等新的形式。寓言中的角色也在不断更新，不少新的科技成果都成为寓言的主角儿，如宇宙飞船、人造地球卫星、机器人、火箭、导弹、计算机、手机、克隆的动植物等。寓言文学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民间土壤。作为一种文学文化的哲理精华，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思想花朵，寓言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更多更广的普及运用。

寓言仍是濒危物种

“寓言需要保护吗？”寓言文学作家汤祥龙曾在媒体上发文追问。他认为，尽管当下寓言文学得到了长足发展，但仍面临不少困境，比如发表寓言的阵地少、创作寓言的作者少。

面对商品经济的大潮和娱乐时代的来临，文学整体在自觉和被迫的双重力量推动下，走向了社会的边缘地带，寓言文学更是退居到文学的核心圈外。即使在已有寓言图书市场中，经典寓言仍占据主流，当代原创寓言销路惨淡。据开卷公司寓言图书销售监测数据，2019年1至9月共销售寓言类图书374万册，其中伊索寓言就占了179万册。在寓言图书销售排行榜中，1000种寓言图书里，999种是经典寓言，只有一种是当代寓言。

老作家多，年轻作者少，也是寓言文学面临的困境。2014年，《贵州民族报·和谐社区周刊》分七期推出《中国当代寓言名家作品选》，其中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作者有3人，50年代出生的3人，60年代出生的6人，70年代

出生的1人，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则一人没有。

寓言文学研究专家陈效东认为，如果把各种文学体裁比为不同的物种，寓言仍是濒危物种。三大寓言作家（伊索、克雷洛夫、拉封丹）的时代早已过去，而新的有世界影响力的寓言作家没有出现。由于无法阅读世界级的寓言作品，我们缺少了借鉴、学习的文学典范以及应有的标杆。

汤祥龙呼吁，寓言作为文学的一种体裁，和所有中国传统文学一样，只有在保护、传承中，才能得到更好的创新和发展。在新的历史进程中，讲好中国故事，寓言作家绝不能缺席，寓言文学应该有其一席之地。

寓言故事是一个强大的IP库

在中国寓言文学馆，寓言故事不再只在书上，它是立体的、多维的，变得可读，可看，可触，可感。通过充分挖掘寓言的多种“潜能”，以“寓见·寓世界·寓中国·寓经典·寓言+”五个板块，通过VR互动体验、360度全息成像等技术，立体展示寓言文学和寓言文化。

寓言是文学，是教育，还是一个强大的IP库。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儿童文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路以庄子举例：“庄子创作的众多耳熟能详的成语，如望洋兴叹、庖丁解牛，可以通过新文创打造成影视作品、动漫形象、互动游戏、衍生产品。”

“寓言的创作、传播一定要求新、求变、求发展，将其与新文创结合起来，通过影视、动漫、音像、表演、视觉、手工工艺、雕塑、广告等形式，借助网络、计算机、VR等新科技进行再开发再包装。”王路认为，中国寓言可以为新文创提供珍贵的活态基因、历史素材和坚实的文化基础，而新文创与寓言的融合，将使古老的民族文化焕发新的生机。

业界专家认为，寓言创作，决不能自设藩篱，仅仅圈定在儿童文学领域。寓言文学要充分发挥新载体作用，既要向传统媒体报纸杂志进军，还要发挥寓言短小、易于传播、易于传诵的特点，善于搭借新媒体，利用微信、抖音、短视频，加大传播力度。实现当代寓言的繁荣发展，秘诀就是“创新”——传统寓言对于今天的创作，既是宝库，又是包袱；既是要突破的对象，又为突破提供了启示。寓言文学作家要致力于创作好的寓言，必须紧扣时代脉搏，关注科技进步，进行题材创新。

由于寓言具有寓教于理、寓教于乐的特征，最受老师、家长和孩子们的喜爱和欢迎，已成为儿童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寓言作者应该到学校、到孩子们中间去，了解今天孩子新的期盼，创作出接地气的、有筋骨的、有道德的、有温度的、弘扬真善美的、受孩子们喜爱的、更为新鲜的寓言。

曾有作家表达了自己对当前儿童文学创作和阅读的担忧，认为当下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大量出版，各种阅读活动也方兴未艾，看起来是繁荣、热闹的，其实大多数孩子并没有爱上读书，也仍然不会读书。尤其是当下大量流水线生产出来的、良莠不齐的儿童出版物成倍增长，有些内容空泛、词不达意，令人不忍卒读。长期以来，这样的作品已经让孩子在阅读中潜移默化，失去了表达真情实感所依赖的母语语感。因此，孩子的阅读问题，首先在于读什么。读太多无益、无良的书，不如不读。那么，在形成阅读兴趣、养成阅读习惯以后，孩子们究竟应该读些什么书？

陶渊明曾在家信《与子俨等疏》中写道：“开卷有得，便欣然忘食。”长久以来，我们都提倡“开卷有益”的广泛阅读理念，在少儿阅读方面也是如此。近年来，全国童书出版市场数据及趋势基本保持正向增长的良好态势，在线上、线下各类图书售卖平台及图书展销活动中，我们能够看到种类繁多、花样翻新、令人应接不暇的儿童读物，其中当然有着体量庞大的优质中外原创图画书、童诗和儿童小说作品，同时，也不乏鱼目混珠的粗制滥造之作。

刘绪源曾经在相关文章中把儿童读物分为药、软饮料和水果三个类别。他认为，一味强调教育价值而忽视了文学性与审美价值的童书就像“药”，有着很强的针对性；追求市场效益、一味讨好儿童口味，写得浅显热闹却没有真正内涵的童书就像“可乐”一类的软饮料，有着很强的成瘾性；而真正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、有内涵的儿童文学佳作则天然的“水果”，能让小读者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有益于身心健康。因此，如何在品类繁多、选择多样的儿童读物市场中，为孩子们筛选、甄别出那些具有营养价值的“水果”，成为推进少儿阅读落到实处的重中之重。

毋庸置疑，孩子们自主地选择读物与家长、教师和社会等多方引导阅读，在少儿阅读的推进过程中是两条并行不悖的线索。《儿童文学》主编冯臻认为，孩子无目的性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，又能有目的地从书籍中自由地吸收养分、滋养精神，完全放纵地投入到文本世界里，在其中欢笑、忧伤、做梦、游戏、畅想，是一种在成年后的岁月中很难再现的乐趣。成人主动选择孩子的阅读资源，干预孩子的阅读趣味，评价孩子的阅读效果，也有可能触发功利性、目的性更强的市场商业行为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能在尽量规避“急功近利”成人阅读干预之余，赋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性选择阅读权力，或许是送给童年的一份最宝贵的礼物。

水果 读物 更营养 教鹤然

塔 雙

孟友亮(85岁,文水县退休教师)

本版面向读者征集“双塔”刊头作品以来，陆续收到一批书法与美术设计作品，并择其适用者刊载。欢迎广大读者继续参与刊头征集活动，作品原稿请挂号寄至：太原市新建路78号新闻大厦太原日报专刊采编中心 王辉收；邮政编码：030002。或可直接递交（新闻大厦18层，联系电话：8222115；邮箱：tyrbwh@163.com）。并请附作者地址、邮编、电话、职业身份介绍。

辛丑年
孟友亮书

一家之言